


论外语教学

付克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论 外 语 教 学
LUN WAIYU JIAO XUE

付 克 著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7 印张 177 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 * *

ISBN 7—5600—0498-9/H·240

定价18.00元

作者简历

1919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
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系。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副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教授。



1938年开始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写作活动。他的《蒙古妈妈》、《麦收》、《婚事》、《中秋寄语》、《我们的贺师长》、《森林里的人》、《小英雄》等小说、散文、特写、诗歌散见于延安解放日报、晋绥日报、晋察冀日报、东北日报文艺副刊和各杂志。

四十年代以后开始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译述工作。译有高尔基的《奥库洛夫镇》、格林的《古撒哥夫斯基》、玛久森娜的《生命之歌》、卡维林的《船长与上尉》（剧本）、沃隆科娃的《森林之家》、戈尔巴托夫的《生与死》（小说集）、弗朗科的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及拉甫林涅夫的《在一个静静的村庄里》（小说集）、塞维洛夫的《冲击柏林》等多种，以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为多。

五十年代初在哈外专，以后在华西大学任教兼任秘书长。较长时间在教育部、高教部高教司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分管外

1984/01

语教育及文科方面的工作。从五十年代至今曾先后赴苏考察高等教育，后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瑞典等国考察，著有《我所看到的苏联高等学校》、《外国教育纪实》、《早稻田大学》等书。

在从事教育工作经历中，外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从五十年代起开始接触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发表过一些论述外语教育的文章。《中国外语教育史》是作者论述外语教育的一部专著，是他对外语教育的长期了解、体验和认识。

写在前面

这本集子是建国前后所写的有关外语教育与教学问题的文章。三十多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我国的外语教育与教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遇到过不少问题和困难，其中虽有成功的经验，但也走过弯路。十年浩劫，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使外语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外语教育与教学同外国先进国家比较，差距拉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对外语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推动。外语教育界的同志们同心同德，奋发努力，迎头追赶，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形成建国以来最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令人鼓舞。可以肯定，到下世纪初，我国的外语教育与教学完全可以赶上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我作为外语教育界的一兵，亲历了外语教育兴衰起伏的变化。每当遭到波折时，就会影响我的情绪。一旦局面好转时，就和大家一样感到高兴，鼓舞。从这些文章中多少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映。尽管我知道这些文章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抑止不住的心情，关心外语教育界所发生的每件事情，促使我尽可能地表示出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和观点是否正确，出发点是想把外语教育工作搞好，希望不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外语人才，为我国的四化大业添砖加瓦，作出贡献。

现在能够收集到的这二十余篇文字，多数已经发表过，部分未及发表。为了保持原来面目，都未加修改。因此难免有过时陈旧甚至谬误的用语、词句和内容。希望同志们批评。

出版这个文集的目的，就是给后来人留下一点历史记录，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外语教育与教学所经历的途程上一点痕迹。

付克

1987年10月

目 录

艰苦创业培育外语人才·····	1
关于学习俄文的几个问题·····	23
改进高等学校的俄文教学工作·····	30
谈高等学校推行阅读俄文专业书籍速成学习问题·····	35
教书育人话延安·····	39
延安时期的俄语教育·····	52
从听说领先说起·····	61
回顾总结 调查研究 立足改革·····	71
总结经验, 进一步提高公共外语教学质量·····	83
关于外语教育和教学的几个问题·····	91
外语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100
努力把外语科研工作提高一步·····	112
对我国外语教材的一点看法·····	120
坚持改革 不断前进·····	129
——在高等外语院校协作组会议上的讲话	
对三句话外语教改方案的认识·····	138
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水平·····	147
——谈一位美国专家的来信	
翻译课初议·····	152
——仅以此文纪念高亚天同志	
忠诚教育事业的楷模·····	163

——王季愚同志逝世七周年纪念

一代名师..... 175

——悼念著名翻译家教育家曹靖华同志

苏联的对外俄语教学..... 180

对中学俄语教学的一些认识..... 190

翻译工作的普及与提高..... 201

略谈翻译基本功及其他..... 204

从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 208

“苏联文学史略”序

“外国文学手册”序

艰苦创业培育外语人才

当1941年抗日战争在激烈地进行之际，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前称抗大）研究班毕业了。我原想仍回前方——我战斗过的部队去。可是军委总政治部派人来找我谈话，说是中央和军委决定在抗大筹办一个俄文大队，专门培养军事翻译人才，以便学习苏联红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使我们的部队正规化。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必须准备将来和红军配合作战。这样，没有一批既懂军事，又懂俄文的干部是不行的。现在决定从抗大和其他学校、机关、部队抽调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学习俄文。谈话是征求个人意见，并不是组织已经决定。我表示仍愿回到原部队，理由是部队送我来学习，就是为了学好本领之后回部队去工作。谈话人表示，可以把我的愿望向领导汇报，但要我做好学习俄文的思想准备。过了不久，抗大训练部一位负责人通知我到俄文队去报到，不必再考虑回部队的事了。

我想，既然上级组织决定了，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服从。所以再没有提什么意见，很快收拾起简单的行李，背起背包去报到了。我之所以能很快地接受这个学习任务，还有一点想法，那就是我在前方（抗日根据地）把延安作为后方，就已经开始我的文学写作活动，而从事写作又直接接受了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的影响。谈到这里不能不追溯一下历史。早在三十年代我读中学时就接触和阅读过一些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而鲁迅主编的“译文”又是我最喜欢阅读的一份外国文学刊物。这些反映现实和战斗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大地吸引了我，在思想上给我以较深的影

响。直到我参加革命，到了部队工作之后，我从一位战友手里得到一本褐色土纸、印刷不太清晰、既无封面又无出版编辑单位的俄国小说选本。其内容多数是俄国和苏联初期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高尔基、安得烈耶夫、绥拉菲莫维奇、伊凡诺夫、拉甫林涅夫、卡达耶夫、潘菲洛夫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这本磨损得十分厉害、有些字迹已不太清楚的小说选本，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传到了我的手中，成了我战争时期唯一的精神伙伴。在战斗的间隙，休整的日子，特别是在战斗出发之前紧张的时刻，借着暗淡的灯光，读上几页甚至几行，遇到精彩的段落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常常引起战友们的好奇和共鸣。此时此刻反而使人的紧张情绪平静下来。有时在风雨交加不能出勤的时候，几个战友躺在铺着干草的土窑里，半天半天地轮流朗读，甚至忘记了吃饭时间，大师傅跑来喊叫才停止下来。拉甫林涅夫（Лавренёв·Борис·Андреевич）的“第四十一”是战友们最感兴趣的故事。虽然有人不以为然地提出，一个女红军战士怎么能爱上了敌人，这是对红军战士的严重歪曲和丑化。但是也有同志认为，一个人的感情是复杂的，不能用一种公式和简单逻辑去理解。红军女战士卡佳虽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戏剧性的爱情历程，但在关键性的时刻，她还是坚决的手下无情的，不失为一个红军女战士。我对作者艺术手段之高妙，故事情节的紧张突然和人物复杂的心理特点，始终把主人公的性格发展摆在尖锐的矛盾之中加以描绘，是颇为叹服的，给人留下了久久不能忘怀的印象。

后来我到了延安，学了一段俄文之后，我得到一本拉甫林涅夫的“Люди Простого Сердца”。这是一本以卫国战争为体裁的小说集。我几乎把它作为一本文学教材，手不释卷地阅读。我发现作者对战争与爱情的关系，战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通过艺术形象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不好处理但在战争中又随时遇到必须处理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我开始试

着翻译了他的几篇小说，如“Портрет”（肖像），“Старуха”（老太婆），“Встреча”（重逢），“Детали（细节）”等等。目的就是想研究一下苏联作家是如何表现和处理这类问题的。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所塑造的各式各样的苏联新农村性格粗犷的农民形象，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他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前线生活特写，取材和人物以及表现方法直接给了我帮助和借鉴。我写的一些散文和特写，不能说没有他的影响。到了延安以后，在紧张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生产劳动之余，还广泛地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除俄罗斯苏联文学之外，如法国的巴尔扎克、斯汤达、雨果、大仲马等人的小说，美国的马克·吐温、斯坦倍克，英国的笛福、狄更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等人的作品。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在文化落后，国民党严厉封锁的延安，不知怎么带进那么多的外国文学名著。大家对这些文学作品就像接力赛一样，你传我，我传他，争相欣赏阅读。一本生动有趣的书可能有一、二十人事先预定，而且几百页的巨著限期二、三天读完传给别人，所以不得不日夜兼读，恨不能一口气读完为快。

在阅读这些翻译名著中，我感到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有的译文生涩难读和欧化（西化）问题，一个长句竟达数百字，有的甚至连断、逗点都不用，读后不知是什么意思，有的形容词堆砌过多，一个名词可以连续用五、六个形容词，读来令人生畏。或者断句太多，把一个长句拆散成几个短句，读起来顺是顺当了，但又嫌太中国化。有些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完全按音译出，使人不懂，如彼得大帝（或彼得一世）竟译成别尔维依·彼得。这些例子，虽然在当时我不懂原文，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苏联文学给我的印象和影响较深。在学习之前对某些译文就产生过一些疑问。当时觉得如能懂原文，不仅可以学习原著的丰富动人的内容和人物的精神面貌，而

且还可以欣赏原著风格、技巧。我怀着这种实际的感受和兴趣，正式进入了俄文学习环境。

延安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是众所周知的一一相当艰苦和简陋。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每月有三元津贴作为学习和生活零用。一个窑洞住七、八个人，设备很简单：大家共用一张长桌，每人一把小木凳一个小马扎。上课时带着小马扎和土纸笔记本，自制红蓝墨水和蘸水笔。每学习班在一孔大窑洞里上课（夏天在露天），膝盖作课桌。所谓课堂只有一块黑板和几支粉笔，其他如打字机、收音机、幻灯，甚至适用的字典都没有。自习和讨论在各自住的窑洞里。晚间共点一盏煤油灯，每晚下来鼻孔变为黑色。后来从边区以外购来一批玻璃罩油灯，窑洞里豁然明亮，这算是很大的改善了。大家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但从来没人叫苦。1943年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号召，整个边区和根据地普遍展开了大生产运动。男同志上山开荒，下地种菜，女同志纺线打毛衣。生活逐渐改善了，每人每天可吃到八钱油，斤半蔬菜，斤半小米。每周还可以有两次馒头和荤菜。生活一改善，学员们的体质和记忆力显著地提高了。农忙时半劳动半学习，收获期全部停课，春冬时整日学习。体育运动是爬山、游泳，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几乎一年四季不断。这样就保证大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从年龄上讲，多数学员均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岁，学习外语的条件，特别是记忆力和反应能力都比较差了。但是由于较多的身体锻炼并充分运用每个人的理解力和分析能力以及他们的学习自觉性，这样弥补了年龄偏大的不足，学习效果应该说是不错的。

办好一所学校的主要条件是干部、教师以及教学方法，教材以及学习工具等等。

学校的主要领导人——校长前后有曾涌泉和杨尚昆。他们都是留苏回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既懂俄文又熟悉政治军事业务和领导艺术。教务主任卢竞如，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办“救国时

报”，后来苏联学习，俄文口笔译均好。主要的任课教师多为留苏回国的老同志，如俄文大队大队长兼一班教员常乾坤，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是老一辈高级技术专家——飞机设计师。解放后长期担任航校校长，军委空军副司令员。他的俄语是地道的，口语和苏联人没有什么差别，军事和技术均具备很好的条件。俄文大队教导员兼教员张培成长期在苏学习和工作，回国后作教育工作很有经验，俄语口语水平也不错。教员黄正光，越南人，长期在法国和苏联学习和工作，法、俄语均精通。教员韩彬，朝鲜人，长期在苏联工作，用俄语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教员李荣华，朝鲜人，长期在苏联，用俄语讲课十分清楚易懂，效果显著。此外如李洁民、刘群、杨化飞、钟毅、赵洵、王连、刘丰、王玉、唐国华等人，前后任教员。他们有的善长口语，有的长于笔译，多数人受过正规的俄语教育，口笔水平很好，知识面广，中文修养很高。但这些教员过去没有专门担任过教学工作，这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系统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特别对语言学、语音学、语法学等方面的知识尚嫌不够。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没有教条和框框，不受传统教学方法的约束。这些对培养军事翻译人才来讲并无妨碍，相反，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和时间解决听、说、译及军事知识方面的问题。如果把过多的时间用于语言知识和理论，语音、语法的讲解和分析，就可能造成教条主义的学习。这一点同学习的目的性和培养目标直接有关。如果是培养语言理论人才和教师那就又当别论了。

外国语学校（包括俄、英两系）的培养目标，虽未见诸于文字，但全校教职员都知道是培养军事翻译人才。但自1944年成立英文系以后似乎有了变化。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已经形成。在远东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英、美、法联合起来，一致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美军在缅甸战场参战，又在云南开辟了基地，以便加强对日战争，同时又派遣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整个战争形势对盟国（中、苏、英、美、法为

主要成员国)有利。1944年夏,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建设外国语学校十分关切,亲自布署建立英文系的工作,并就挑选干部和教师,选拔学员作出指示和要求。同年秋,他在向外国语学校全体人员讲话时,指出为迎接全国的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工作。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树立新中国的气魄和精神。他一再强调,外国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人才,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使外国语学校有更多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外交战线工作。

至此,学校的任务扩大了,培养目标也相应地加以改变。除了建立英文系外,俄文系还成立了政治班,侧重政治理论方面的课程。培养目标虽然突出军事翻译,但对军事翻译的具体要求和人才素质,从教学内容方面已有所表现。就俄文系来说,除了俄文课之外,还有政治理论课,如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这些课均采取上大课或讲座方式,辅以自学和讨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避免教条主义,改造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出发点,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强调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收到了很突出的效果。政治理论教员有陈唯实、张庆孚、陈炳炎、何定华、李逸民等理论家。另外还有时事报告,报告人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杨松等领导人。此外还设有军事课和军事训练。在生活管理上也是军事化的。总之,是按照一个军人的要求进行外语和军事、文化知识教育,以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既懂军事又懂俄文,政治思想素质好的军事翻译人才。

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学校除教务处之外,还设有政治处(主任是老红军叶和玉),负责干部管理、政治思想工作,发展党员,党员的学习和组织生活。思想工作富于针对性,从每个学员的不同特点出发,把工作做到学员,以理服人,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强调个人的自觉性,开展谈心活动,这些作法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以现在的观点看，这种培养人才的办法是符合当代外语人才的要求的。就是说既懂外语又懂专业，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十分重视学员的中文修养，在选拔学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条件。入学后凡中文条件不好者则编入国语班进行补习。这样，学员毕业参加实际工作后就具备了较好的适应能力。

课程设置。我把它归结为讲读、语法、会话和翻译四种课型。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其他教学资料以及工具书。讲读课是最主要的课程，每周三、四次，每次二学时。课程内容主要由教师自选，可以说找到什么材料就教什么，这里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苏联报刊，主要是从“真理报”和“消息报”“红星报”选择的社论、论文、通讯报导、重要政治军事消息，内容侧重在军事方面的，也有文学作品。其次，从现有的俄文书籍中节选的部分内容，如联共党史、列宁文选、高尔基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第三是教员用俄文编写的材料，如延安的气候和生产运动，同国民党的斗争，抗战小故事，领袖人物记述等等。这些临时编写的短文写得生动活泼，句子结构和语法简单明了，易读易记易上口，效果显著。常乾坤编写这方面的材料十分容易，他既了解学员的程度，又有很好的俄文写作能力，随手写来，即成一篇。选自文学作品的段落，有的比较艰深，例如高尔基的小说则很难用日常的语言表达和讲解出来。我记得有一句：“Собака подходит, солнце Загареет что между ними...”有的学员提出，从上下文来看，狗和太阳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突然出现两种无关的东西？教员作了很多解释，同学们还是不甚了了。因为它是在一篇小说里选出一段，不看全文是不易理解清楚的。何况文学作品情景的描写不能用说理文去分析。后来还编了“军事文选”、“时事述评”、“俄文会话读本”等教材。

上述选择课文的办法，好处是注意了中心内容（军事）和多

样化，但考虑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近及远诸教学原则不够。所以课文内容深浅坡度较大，有些课文只能作为文学作品去欣赏、阅读，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文艺修养。

讲读课既然是主要课程形式，因此它必须起到提高阅读能力，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的作用，选得适当还可以作为口语会话材料的补充，一举数得。但是在材料来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难得到合适的教材，这是教师很伤脑筋的问题。大约在1943年下半年，从苏联运来了一批书报杂志，包括部分政治、军事、文学的书籍，因此学习材料较为丰富了一些。不过合适的教材还很少，连苏联中学用的语文课本也很少。就在这一年从著名诗人肖三那里得到了 Александр Евдокимович · Корнейчук（高涅楚柯）的“Фронт”（前线）和描写德国法西斯迫害知识分子的剧本“马门教授”。这两个剧本作为文学教材来讲授，同时也作为会话材料使用。“前线”对于学习军事知识和术语很有帮助。“马门教授”写的是一个外科医生的不幸遭遇，距离当时的现实生活较远，因此借助它练习口语有一定的困难，但对理解艺术语言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当我们试图把舞台语言运用到（或称套用）生活中的时候出了不少笑话。正如老师所指出的，尽管讲出的话是符合会话法规则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这么讲。可见书面语言变成日常生活用语还有一个消化吸收和重新构造的过程，生搬硬套会造成外国人不懂或中国化的表达方法。后来肖三把两个剧本译成中文上演，看了话剧对于理解原文帮助很大，特别是对照原文来读，对于原著的语言、艺术风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等于开了一门翻译课（俄译中），初步懂得了译法、技巧、修辞等方面的问题。按照原来的学习计划，曾预定肖三的“修辞学”讲座，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来讲，他的译文也算是补上了这个损失。五十年代我在北戴河作家协会休养和肖老住在一起，曾谈起这段历史，说起他的译文是我学习的楷模，受益非浅。他谦虚的说，其实译文还是有缺点的，有些地方

仔细斟酌不够，因为要赶着排戏，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研究思考。我的老师常乾坤曾评价过肖的译本，认为肖老是有名的诗人，文学语言修养和俄文水平都很高，他译剧本最合适不过，译文水平很高，很值得大家学习。但有些军事术语和习惯表达方法还有值得商酌的地方，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过分要求。

总之，讲读课的材料是杂乱的，几乎是得到什么就讲什么，除了军事知识外，其他方面就谈不上计划性和系统性，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其次是语法课。语法课比讲读课还要难办。一则没有可资参考的学习材料，只有刘泽荣先生主编的“Русский язык”（俄文文法）和参考该书由师哲、王重夫编写的语法讲义（为延安俄文学习班编写），此外再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了。其次，多数教员不是“行伍”出身，并没有专门讲过语法课，缺少这方面的经验。语法课的讲法，一开始就是字母、读音、拼音拼写、词法、词类、变格变位到句法等等。学员们对于俄语还没有感性知识和基本概念，只能跟着教员一步一步地走，办法就是死记硬背。有些人被P、B、H等字母所苦，发音不准，只好跟着教员的口形模仿。教员用中文讲解方法，一个一个纠音。有些南方人对某些字母和音节念不准，或者同英语字母弄混。总之，初期的学习是艰苦的。但是，学员有个共同认识，认为再艰苦也要坚持下去。因为语法是学习外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不掌握它是不行的。教员也常向大家说，语法是一把钥匙，俄文是锁，要想搞通俄文，首先要搞通语法，钥匙掌握了就一通百通。可是有的教员不太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基本的语法规则应该掌握，但不必死扣死背，这对初学俄文的人太吃力，太费时间。有些语法规则和现象在讲课文中会自然解决，不必专门死记硬背。根据留苏回来的教师的经验，他们都没有专门学过语法，但是他们说话、写作，语法基本上是不会错的。因此语法应在语言实践中自然掌握，即使有时在讲话中不一定完全符合语法规则，话还是可听懂的。尽管